

诗意的张扬与理性的建构

——近5年军旅诗歌及理论批评一瞥

■朱向前 徐艺嘉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盘点近5年的军旅文学概况,笔者发现,除小说、报告文学成就斐然,诗歌及理论批评领域也取得了一些颇为可观的创作成绩。

先说诗歌。

在诗歌领域中,刘立云、王久辛、曹宇翔等实力派诗人笔耕不辍,作品保持着较高水准和较大影响力。他们的诗来自生活最深处的挖掘,将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军人内心世界艺术地表现出来。王久辛的《蹈海索马里》秉承了他抒情长诗的创作风格,以热烈饱满的情感和铺陈渲染的语言,彰显了中国军人的牺牲和担当精神。曹宇翔为庆祝建党百年而创作的长诗《黄河诗篇》,重在呈现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和底色,磅礴的气势和精微的细节,展现出诗人强大的题材吞吐力和创造活力。

近年来,刘立云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先后创作了《金山岭》《上甘岭》《一个人和一面碑》等颇有分量的长诗,出版了《大地上万物皆有信使》《刘立云诗选》和《金盔》等3部诗集。刘立云的诗歌语言质地坚实而有力。他的诗浓墨重彩抒写士兵的生活和形象,也反映出中华民族积淀深厚的底蕴、气质和精神。其中,《上甘岭》堪称气象壮阔的战争史诗的缩微版。诗人以多维的视野、人类性的眼光,书写战争背后的人性之精神内涵,探索战争本身残酷又复杂的历史奥秘,传达了尊重生命、思考人生、追求正义、捍卫和平的崇高理念。《金盔》收录了刘立云35年诗歌创作的精华,分为《方阵》《营盘》《高处》《芳华》4辑,既是一次多年创作的整合,也是一次创作灵感的集中爆发。诗集用一种火焰般的语言和饱含热泪的深情,把军营中的点点滴滴细腻而多维地搬运到纸上,写出军人真实的心灵感受,表达出新时代军人的追求、思辨和梦想。

老诗人峭岩擅作长诗,近几年有一百多首诗歌作品问世,其中最关注的有《写给祖国的圣词》《七月!七月!》等作品,这些诗歌建构起一种与时代同步的诗意而深沉的表达。诗人善于发挥长诗承载社会和时代精神的文体优势,充分驾驭长诗宏大叙事架构,通过绵延不绝的抒情渲染、跌宕起伏的情节造势、别具一格的语言方式,体现出大气磅礴的创作风貌。尤其在表现百年党史方面,他的诗歌将叙事性、思想性和抒情性很好地融为一体。杜志民潜心于军旅诗的创作,并对军旅诗的意蕴和技巧有着较为深刻的研究。近年来,他先后发表组诗《八月前沿》等作品,激情迸射,兵味纯正,可谓宝刀不老,体现出军旅老诗人的强大后劲。

诗歌领域的中坚代表如姜念光、丁小伟、陈旭等几位诗人,他们不懈创作,持续攀登军旅诗歌高地。姜念光创作的最大特点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用崭新姿态对军旅诗展开深入探索。他是在大量阅读中西方诗歌的基础上,展开有方向、有目的、有难度的军旅诗写作。深厚的现代军事知识储备以及对战争的深刻理解,支撑他的诗歌创作主

动对加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在书写新的军旅生活方面具有显著专长。他的诗歌理念、节奏和语言具有强烈的现代属性,他的文字在钢铁质地和光泽之外,还带有鲜明的美感和哲思的意味。在短促的句子中能体味到诗人对古典文学营养的汲取,能够感受到他对生活深入而驳杂的思考。

近两年,在中国诗歌界,《强军,强军》和《岁月青桐》是受到较多关注和好评的诗集。两部诗集的作者刘笑伟有着扎实的部队基层体验,丰富的任职经历使诗人思想敏锐、视野开阔。诗人的诗歌创作紧密跟踪我军现代化发展的历程,近距离观察并准确触摸到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脉动。尤其是《岁月青桐》,共计77首短诗,诗集中的句子将鲜活的军旅生活铺展在读者面前;诗句短促、严谨,将鲜活的诗意、保家卫国的责任感连接起来,让诗人的军旅生涯融为一体,这使得他的诗歌有了青铜的质地和底色;既让读者感受到摧枯拉朽般的宏阔场面,又能看到熟稔而精微的军旅生活细节。这是诗人的情思在飞扬,也是战士的青春在燃烧。

丁小伟的诗歌创作试图建构起一种宏大而深远的精神世界。长诗《筑梦强军》清晰地勾勒出打造世界一流军队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的壮美画卷。反映人民子弟兵勇敢战“疫”、逆行不退的诗作《信任》,用诗情映照这支军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让信仰之火熊熊燃烧,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英雄精神激发力撑,给读者以持续的慰藉和力量的支撑。陈旭是典型的与基层连队摸爬滚打出来的战士诗人,也是曾经在战场上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勇士。他的诗句带有新鲜、热血、青春的气息,散发着硝烟味儿和兵味儿。近年来,他相继有《士兵花名册》《怀抱受伤的时光》《窗口》等诗集出版。陈旭的诗歌主线是坚定的,从前线的猫耳洞到野战医院的病床上,再到捍卫党纪国法尊严的纪检监察战线,他的诗歌始终保持军人本色和战士情怀。

正在崛起的军旅诗歌“新生代”中,艾蔻、雷晓宇、朴耳、王方方、董玉方、李庆文、许诺、董庆月等年轻人成为军旅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惊喜。这些青年诗人的文化起点高,自我学习和超越能力强,对军营日常生活的感悟力和敏锐度都令人可喜。他们刚走上诗坛就有能力在《人民文学》《诗刊》等重要刊物上发表组诗,显露出极佳的潜质。《诗刊》创办的“青春诗会”是全国优秀青年诗人向往的成长平台,艾蔻、雷晓宇和朴耳接连被吸收为“青春诗会”学员,显示出军旅诗歌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的良好局面。

女诗人艾蔻把目光投向历史纵深,笔下再现的战争和历史有了新的生命境界。书写当下的军旅生活时,艾蔻的情感通透自然,进入诗中的情景、物都是触动她情感和思绪的普通事物和日常经验。近年来,雷晓宇的组诗《风雪记》《大地上的箫声》《列兵日记》《薄雾》等相继在《诗刊》《解放军文艺》和《人民文学》等重要文学期刊发表,出版有诗歌专集《雪山入梦》。作为80后军旅诗人,他的写作与传统军旅诗歌不同,有一种别样的气质。

他的诗歌兼具古典美学与现代技法的 专长,在刚健雄浑之外呈现出悲悯、博大与神秘的底蕴,这得益于他较强的自省意识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钻研。朴耳试图对军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进行迥异于他人的“陌生化”艺术加工,尤其善于把捕捉到的有意义的军营生活与自然流转、四季轮回联系在一起。她的《黄昏伞》《良田》《星星连》等作品,用极富想象力的意象和诗句带领读者体悟别样军营。董玉方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念念不忘军旅诗创作。他的歌词创作和军旅诗歌一样,以强烈的散文化的叙事和抒情气质,令人耳目一新。

再来谈理论批评。

201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隆重推出。这是主编者带领两个学术团队持续研究近20年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全书以近90万字的体量,全面梳理、总结了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等传统文化,以及戏剧、电影、电视剧等艺术门类的成就、经验和局限。全书的最后,还附录了260余位作家的小传和一个近8万字的军旅文学年表,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当代军旅文学的资料谱系。与此同时,该书主编及其团队还开启了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的遴选、编辑与出版。此外,该书主编对军旅文学始终保持“在场”的观察和追踪,撰写了多篇军旅文学的年度综述。在此基础上,又主编了11卷本《新锐军旅作家“向前”丛书》和年度军旅文学选粹,“选粹”迄今为止已连续出版了4年。由我们合作的《庚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徐怀中论》近两万字,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徐怀中的创作风貌与文学特质。该文在《中国文艺评论》发表后,即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汪守德近年来在理论批评领域持续发力,为军旅文学乃至范围更广的当代文坛留下许多及时的跟踪、观察和思考成果。他将重要军旅作家作品纳入研究视野,不仅对单篇作品多有评述,还在《神剑》杂志开设专栏,以“重读”为题,细致剖析多篇军旅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经典作品,赋予其新的阐释和意义;还陆续写下了《箬路蓝缕 绝代风华——新中国70年军旅戏剧剧观》等对军旅文坛有着宏观判断及把握的理论批评文章。此外,他对地方文坛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京剧、地方戏等多个领域有所关注,对诸多艺术领域的创作规律、审美范式均有所涉猎、钻研和推敲。2022年,汪守德推出《梦见:周振天创作艺术论》一书,以作家、编剧周振天的创作为审美对象,全方位地回顾、描述周振天的创作成果和艺术风貌。这部38万字的理论著作以专章的形式,对周振天各个门类共53部作品进行了“庖丁解牛”式的分析和阐释,以期探索文学和影视艺术规律。除却理论批评家的身份外,汪守德在诗歌创作和评论方面亦有建树。他写诗、评诗、鉴诗,《诗情》,在历史的隧道里激荡一文评论晏子的长篇散文诗《我眺望祁连山的身影》,倾听历史的回声,诗情洋溢、兴味盎然,体现了他在诗歌方面高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杨克在他的诗集《我在一棵石榴里看见了祖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10月)里,以当代诗人的眼光与情怀,表达了浓烈的爱国情感。这种爱国情感的表达,是建立在 对时代意象的新发现之上的。诗歌是与时代相关的美学产物,体现着诗人的审美趣味与审美风格。杨克的诗歌近作,发现并呈现了许多新的时代意象:一个是以重大历史或突发事件(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对象的意象系统,一个是以高科技生活环境为对象的意象系统,一个是以地球生态变迁与保护为对象的意象系统,一个是在与古人对话中表现今人生活的自我意象系统。

时代意象的发现与表达

■邹建军

杨克在《新工业时代的诗歌维度就是未来已来》一文中,表达了对时代性的清醒认识:“一个诗人不仅要从已有的文学学会什么,更要给已有的文学提供什么。新的事物,新的发现,新的表达。”“提供什么”表明诗人对时代性现象有新思考,“新的”表明诗人对时代性现象的关注有自己独特的发现。近年来,杨克以独特的眼光,发现并且表现了诸多富于时代性的意象。在《我的中国》《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祖国》《大东湖》《我对黄河最真实最切身的感觉》等作品中,杨克发现了东方中国的自然山水之美,把自我与祖国的关系表现得生动丰富、多姿多彩;在《苏东坡》《仙游寺遭遇白居易伏案疾书长恨歌》《轻亦敬亭山,重亦桃花水》《风度张九龄》等作品中,杨克以自我之身与 中国古人对话,把古老的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的关系表现得风生水起、淋漓尽致;在《天河城广场》《大湾区的天空》《在天河》《花城广场》等作品中,杨克以身处其中的平民视角把改革开放以后的东方都市与自我之间的关系,表现得丝丝入扣、生动圆融;在《疫情中从容的广州》等作品中,杨克以当代诗人身份与疫情下的人们进行对话,把重视生命与友情的自我与更广阔的人群之间的关系表现得自然贴切、活灵活现;在《离群的小公象》等作品中,杨克准确细腻地感知地球生态发生的变化,把自我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毫发毕现、独到深刻;在《时空之门》《六维空间》等作品中,杨克以敏锐的视角发现高科技时代个人生活的微妙变化,把自我与高科技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清晰而深刻。可以说,杨克把自我与时代的各种关系,以诗的方式进行了全方位的独到表现,在 诗思、诗情、诗意、诗美、诗形、诗艺等层面进行了有力探索与深入表达。

杨克的诗歌创作在时代性的发现与艺术表现方面,提供了如下启示:第一,诗人要尽量参与新时代、感知新时代、融入新时代,以自己的诗作关注与表现新时代里的人与事。第二,诗人要关心这个新时代的前沿发展,包括思想的、文化的、哲学的、生态的、科技的前沿,因为它们构成这个时代生活的要件,特别是 要关注新变化及其所产生的重要意义。

第三,诗人对于自己生活的地方、到过的地方乃至向往的地方,都要力争有独到的发现与想象。杨克对广州、岭南等象 象的表现是独特且成功的。第四,诗人对于新的时代生活要有思辨的精神,在艺术表现上要达到深入细致的地步。第五,诗人对时代性事物的表现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总是要以意象的方式、有趣的语言和个性化的形式来表达。杨克诗作中与时代性相关的4个意象系统,是对时代形象的审视与对诗歌 技艺创造性的彰显。

快速变化的现实生活,给诗歌创作提供了海量的新题材、新主题和新思想。诗人既要关注世界里的中国,也要观察中国里的世界。诗人要处理好自我、自然、祖国、人类与世界等多重关系,对时代生活进行更加全面的观察与深入的思考。诗人要与时代同步,与时代同行,在新的时代里不断有新的发现与新的表达。时代性意象的发现与时代性意象系统的建构,是新时代对于中国诗人所提出的要求。杨克的诗歌近作在这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

文艺评论



扶贫行动——今年果实格外甜

张小磊作

(中国画,庆祝建军95周年全国美展暨第15届全国军展入选作品)

长征

第5550期

事件、故事与叙事

■曾 琴

就叙事结构而言,王昕朋的小说大都是事件驱动型的写作,从难以纾解的矛盾中生发故事,以此牵引人物关系,使得小说具备一种系统性的架构,总体是探寻当代性的现实命题,构筑总体性的价值观念。考察这个叙事链路很有意思,因为当下的小说写作容易陷入消解化与碎片化的窘境,时常局限于表达细小的情绪,传递私密的情感。因此,小说需要重建一种新的“现实”,达成从事件到故事,再进入叙事视阈的伦理修辞和价值再造。

具体而言,事件驱动型的小说,往往经由如下路径生成叙事:其一为发酵性事件,肇始于故事的开端,不同人物悉数登场,各方力量在周旋,

但始终处于蓄势阶段,没有形成具体的判断与演变;其二为推动性事件,故事在这里构成进展,改变了启动或起步的局势,处于引起质变前的量变;其三为转折性事件,小说产生转机或转机,主题间或善或恶的力量发生更迭,但在倾斜的天平中保留悬念;其四是决定性事件,故事的突变与人性的豹变流溢其中,甚至直接做出方向性的选择,指向事情的阶段性终点,辨析事件之性质与人性之伦理;最后是延伸性事件,常常交代叙事走向与人物命运,又或提供开放性结局。当然,此中亦可以是意外的转折、反转,却常常指涉价值的升华和意义的昭彰。

王昕朋的小说《北京吞月》(《当代》2022年第4期),事件发生在一个社区里,所谓“吞月”,说的是一社区与二社区的两栋大楼之间有一处过道。这是一个大约4米多宽的弹丸之地,正是在如此狭窄的场域发生了紧张而精彩的叙事。张四是 大别山人,来京谋生。他古道热肠,利用自己早晚的休息时间,为工地的工友义务修鞋,随后开始以以此维持生计。一次偶然的经历,他捡到了一只金戒指,这可把他急坏了,他四处奔波,只为物归原主。在四处找寻无果后,张四干脆将修鞋摊开在 最可能出现失主的一、二社区的两栋大楼的吞月处。

问题在于,当张四面临现实和精神危机时,剩下的便是情感的牵牵,这也是张四在受挫之后重返北京的缘

由。小说里,张四回到北京后,在车站经历了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在罕见的暴雨中,他不惧危险,帮助一社区抗洪排涝,获得了居民们的一致认可;最终,张四慢慢学会了修鞋、修锁、配钥匙、理发、修自行车、通下水道……小说收尾处,张四得以在社区安身立命,得到邻里的喜爱,并受到区里的表彰。小说也由此完成了从事件的多重发酵,到故事的完整形塑,再到文化辨知的叙事建构。

总而言之,王昕朋小说提示出当下小说创作的问题意识和叙事形态。尽管在情感现实与话语修辞层面尚有可讨论之处,但作家发现并处置现实问题与时代的精神的叙事伦理,颇为难能可贵。